

西方边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反思

孙保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西方边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 对中国边疆研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 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反应也颇为复杂, 其中不乏误读、偏见、盲从抑或滥用。通过重新梳理可以发现, 西方边疆理论是基于特定历史经验产生的, 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 甚至还蕴含着一些于我不利的话语和逻辑, 因此不能完全适用于阐释中国问题。随着边疆问题和边疆意义愈显突出, 学术自信和学术自觉日益增强, 构建中国特色边疆理论的问题已空前凸显。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客观审视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 应以有效知识供给为导向, 以本土知识生产为内涵, 以概念工具创制为基础, 以融入世界知识体系为前瞻, 推动中国边疆理论的建构、创新和超越。

关键词: 西学东渐; 边疆; 边疆治理; 边界; 边境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5-0147-06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并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之一, 但边疆研究长期处于一种自在状态, 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概念、知识和理论。近代以后, 在西方列强的诱胁之下, 中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同时, 也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疆研究。中国边疆研究从此由自在阶段进入到自觉阶段, 并先后掀起了以西北史地学、边政学和边疆学为标志的三次高潮。中国边疆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同时也是西方边疆理论广泛传播的过程, 由此被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近年来, 边疆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更显突出, 边疆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已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边疆问题前所未有的强调, 将边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 随着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不断增强, 以及最高决策层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 构建和创新中国边疆理论的必要性空前凸显出来。而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边疆理论体系, 并以此实现有效的边疆知识供给, 首先就面临着如何看待西方理论的问题。毕竟中国的边疆研究, 是在西方因素的外部刺激下开启的, 并在发展演变中受到了西方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 在当下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学界对于西方边疆理论仍存在

着一些误读、偏见、盲从抑或滥用现象, 由此引发了一些无谓的争议, 对中国边疆理论的建构和发展造成了干扰。面对这个问题, 对在中国传播已久并影响颇深的西方边疆理论进行重新梳理与审视, 就成为一项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工作。

一、西方边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西方的边疆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在通过战争不断向外扩张国家版图的过程中, 罗马逐渐形成了帝国的边疆和边疆制度, 并开始有了描述边疆的词汇和话语。然而此时有关边疆的表达, 总体上是零散的, 远没有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随着欧洲进入中世纪, 在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的政治形态下, 国家与国家疆域观念变得模糊。作为国家疆域的构成部分, 并由国家权力管控和治理的边疆, 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此后, 伴随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开启, 边疆才重新在西方世界受到重视, 并得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表达。因此,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边疆理论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 特别是在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出现并形成相关理论之后才逐步形成、发展起

收稿日期: 2018-03-12; 修回日期: 2018-06-09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研究”(17CZZ043)

作者简介: 孙保全(1986—), 男, 河北沧州人, 法学博士,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边疆治理, 联系邮箱: yndxs9@163.com

来的”^[1]。民族国家形成以后,便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制度优势向全世界扩张,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构建起来的知识,带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边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也是在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自秦建立以后,便进入了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国家时代,并且形成了稳定的与王朝体制及其治理需要相适应的边疆制度和边疆文化。晚清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中国的国家形态逐渐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发生转型。在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而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无限的“天下”疆域想象,逐步被有限的国家领土所取代,中国人开始按照西方的规则和思维来改造自己的边疆观念和边疆话语。随着主权领土观念的广为传播,历史上按照“华夷”文化标准来认识边疆的做法,慢慢地就被以边界为参照的边疆界定方式所取代。古老的中国也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得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主权,以融入西方主导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此时,丧失话语权和文化自信的国人,不但按照西方样板来自觉地改造对于边疆的传统认识,而且也主动地接受着关于中国疆域和边疆的西方式的解读。来自西方的“中国本部”(China Proper)^[2]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流传于中国的,并对中国疆域和边疆观念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孙中山、邹容、刘师培等政学两界人士,不仅广泛用这一概念来指代汉族聚居的内地,而且还相应地普遍使用“疆部”(藩部)一词来指称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革命派那里,“中国本部”概念又同“十八行省建中华”的种族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从而在国家建构层面对这一时期的边疆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以后,西方边疆理论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影响力也日渐扩大,这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边疆著述的译介。此时,学界对于西方的边疆研究成果和研究动向颇为关注,并自觉推介和接受相关的理论观点。如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经出版,旋即被译成中文。译者赵敏求在译本序言中,显示出了对美国边疆学派的熟知和深入思考。二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提出之后,便迅速传入中国,其影响在民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时期,国内的《海疆月刊》等杂志就是专门为研究海权、海疆问题而创办的。时人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成为中国第一本研究海权理论的专著。不仅如此,意大利人杜黑的《制空权》一书出版后,也受到国人的

热捧,并被奉为“杜黑主义”,引发了国人对于空中疆域的关注。诚如时人所言,由于受到西方海权、空权理论的影响,中国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三度空间观念”^[3]。这也成为认识和研究海洋边疆、空中边疆的观念基础。三是西方相关学科的启发。由于中国边疆地区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西方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和边疆调查,也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曾一度沉寂,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恢复,并在今天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领域。在边疆研究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的边疆理论再次受到重视:一批研究成果被翻译为中文,理论内涵被更加完整而深刻地理解,相关概念和观点广为引用,影响力日渐彰显,甚至出现了“言必称特纳”“言必称拉铁摩尔”的现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中国传播范围最广的西方边疆理论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经典文献,尤其是以特纳为代表的历史学视角和以拉采尔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著述,广为流传;二是对中国边疆的理论阐释,其中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濮德培等人的影响最大;三是有关超主权的新形态边疆的论述,尤以美国1980年代提出的“高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的概念和理论最具代表性。

纵观清末至今的中国边疆研究,始终伴随着西方理论的传播和影响。归纳起来,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西方边疆理论可分为两种类型:专门性的边疆理论,即直接围绕边疆现象开展研究而产生的理论;“涉及性”的边疆理论,即其他研究领域中与边疆间接相关的一些理论,如地缘政治学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理论。在过去的百余年时间里,中国的边疆研究被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范式的烙印。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影响的产生,同近代以来西方长期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事实直接相关。不论是西方的现代国家体制还是其建构的知识体系,都曾是中国极力效仿和尊崇的对象。反观中国,包括边疆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却存在着明显的知识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因而在面对日渐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时,就不得不诉诸西方的理论路径加以分析和解释。不过,这样的趋势正在发生扭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已然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理论自觉,西方边疆理论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也在这种理论自觉中悄然发生着改变。

二、学界对西方边疆理论的拒迎

西方边疆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近代以来的三次“边疆研究高潮”都受到西方因素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界对待西方边疆理论也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心理，而西方理论的传播最终又是通过国人的心理机制发挥作用的，这是一个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拒”与“迎”的标尺上，可将学界对于西方边疆理论的复杂态度进行如下的大概分类。

（一）怀疑拒斥的态度

近代以后，西方边疆理论在传入中国并推动国人形成主权、领土、边界、边防等现代疆域和边疆观念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重大的负面效应，由此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惕和反思。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东北边疆的行为，对学界的触动非常大。傅斯年就在此时洞察到，“满洲”一词背后蕴含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4]，因而主张用“东北”来取代“满洲”概念。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他进一步提出要慎用甚至不用“边疆”一词，还专门规劝顾颉刚等人要“少谈‘边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5]。如果说当年傅斯年是从国家领土安全角度出发对陆地边疆概念提出警示的话，那么时下一些学者对西方边疆理论的排斥，则主要表现为对“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新形态边疆理论的否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利益边疆”等新形态边疆理论带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本质上与国家主权原则相违背，同时也容易授“中国威胁论”以把柄；另一方面，在其看来，这同以陆地空间和少数民族地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边疆观念难以兼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

（二）理性批判的态度

民国时期已有人看到，西方的边疆理论并非普世真理，不仅存在着难以适应中国实践的问题，还存在着威胁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的问题。历史学家陈守实在当时提出，按照西方殖民政策的思路来理解中国的边疆历史，是完全错误的，应基于中国史料来开展边疆研究^[6]。杨志成认为，“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让我们来干一干”^[7]，主张加强边疆地区的实地调查活

动。类似于这样的认识，意在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来开展边疆研究，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理论。而顾颉刚则从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有力地批判了国人不加辨别就接纳西方话语的做法。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提出“中国本部”以及“华北、华中、华南、化西”等舶来词都暗含着将边疆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的意涵甚至阴谋，因应杜绝使用^[8]。当初顾颉刚忧虑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美国“新清史”学派提出的清史研究“去中国化”的主张，遭到了多数中国学者基于学术角度和政治立场的强烈批判。在国内学者看来，将清与中国相区别的观点，同历史上日本人杜撰的“满蒙非中国论”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合法性及国家领土的统一完整，都构成了严重的潜在挑战。

（三）选择借鉴的态度

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这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文中，曾明确表示：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大都关注殖民行政、殖民教育、殖民福利和殖民地文化，这在中国的边政学研究中可被借鉴并转化为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民福利，以及边疆文化的内容。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西方政治学特别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学科，“对于边政学可有独特的贡献”^[9]。历史上中国边疆研究的先行者，对于西方边疆理论的筛选、转换和吸纳的诸多努力，由此可见一斑。当代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海疆研究、边疆经济研究、边疆民族宗教研究、边疆社会研究和边疆治理研究，在构建和发展过程中都从西方边疆理论中汲取到了丰富的养分。近年来，一批研究者开始从传统边疆领域转向新型边疆领域，并将目光投向西方的新形态边疆理论。对此，周平就提出：“当前的边疆研究也应该以理性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新形态边疆问题，进而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这些新形态边疆的概念和理论来言说和论述中国的海外利益空间、海外利益以及运用国家力量去进行维护的问题，从而在借鉴的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10]

（四）全盘接受的态度

对于西方边疆理论——更多时候是其中的某种理论——不加仔细审视和反思，就直接进行全面的接受和运用，这种学术态度看似荒诞却颇为流行。从清末对于“中国本部”概念的广泛使用，到民国时期运用西方殖民地理论来言说中国边政，到当下鼓吹“新清史”研究视角的合理性，全盘接受西方边疆理论的现

象一直都存在。直到今日,仍有人将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和观点奉为经典,并作为普适性的真理来使用。更有甚者,以西方的边疆理论作为学术标准,来衡量国内边疆研究的优劣,由此掀起了许多无谓的争论。这种边疆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由长期以来西方学术话语强势传播带来的思维惯性所导致,另一方面也与缺乏对中国国情和边疆区情的准确把握有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对待西方边疆理论的态度依然大有市场,并对中国边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形成了不良干扰。

三、对西方边疆理论的理性审视

西方边疆理论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强大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影响最终是朝向正面还是负面发挥作用,则又取决于国内学界对于他山之石的反应。近代以来国人对于西方边疆理论的态度颇为复杂,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也不乏以讹传讹的误读和生搬硬套的滥用。为更好地理解西方理论、澄清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得不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以扬弃的态度对西方边疆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审视。

西方边疆理论本身并不完美,甚至存在着明显的缺陷。1870年代以后西方的边疆理论进入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11],但自此以降的边疆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既不系统也不统一。其一,核心概念的散乱。在美国,特纳在提出边疆假说之时,就无意于为边疆下一个“严格的定义”^{[12](3)},因此在特纳那里,“边疆”就成为一个“清晰世界中的不清晰概念”^[13]。而当美国学者将研究视野转向他国时,所界定的边疆内涵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各自所指的边疆往往不是同一事物。在欧洲,地缘政治学和历史学学者眼中的边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其二,研究领域的分散。西方的很多学科都涉及边疆研究,但除极少数的学科外,很难看到专门围绕边疆开展的大规模研究。更多时候,有关边疆的论述是散落在不同领域之中的,更遑论统领性和整合性的系统研究。其三,一般理论研究的断裂。现代意义上的边疆理论始于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曾对边疆问题进行过深刻的理论阐释。但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一般性的边疆理论研究已经慢慢地让位于微观的实证研究,或收缩为狭义边疆即边界和边境的研究。

西方边疆理论是基于其特定历史经验产生的,并

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中西方的国家历史和边疆历史,均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使得建基于西方经验的边疆理论很难完全适用于中国。以边疆的基本内涵来看,有美国学者提出,“边疆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社会之间相互渗透的区域”^[14],这种定义实际上反映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于边疆的认知。特纳就认为,边疆是“野蛮与文明的交汇点”^{[12](2)}。拉铁摩尔指出,“就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而言,它(边疆)是一个过渡地带”,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性社会”^[15]。普莱斯考特将边疆分为两种:政治边疆,仅存在于古代社会,是两国之间且不受任何一方控制的区域范围;拓居边疆,指一国内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区域的分割地带^{[16](25)}。将边疆视为一种独立性和过渡性的空间范畴,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将国家疆域边缘认定为边疆的观点,可谓判若天渊。这种根本性的差异,就使得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边疆的做法通常难以奏效,甚至是缘木求鱼。

运用西方边疆理论来阐释中国问题,面临着知识供给不足的困境。在历史上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的边疆理论曾遥遥领先于中国。此时,运用相对丰富的西方理论来回答中国问题,虽然在内容上也存在着不适应问题,但从形式上和表象上来看是“游刃有余”的。但是目前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即便削足适履地照搬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边疆实践、回应现实需要,也仍显得捉襟见肘。首先,陆地边疆研究内容的缩减。在西方学者看来,“边疆是指大小各异的地带,它们在多个世纪前普遍存在。截至1900年,边疆已经消失殆尽,被边界取代”^{[16](3)}。他们的陆地边疆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向边界和边境收缩的趋势,这显然无法适用于中国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来划定的边疆范畴,而其历史上的陆地边疆理论则由于时过境迁而变得不合时宜。其次,海疆和空疆理论的陈旧。西方地缘政治学中的海权论和空权论,由于直接涉及海洋和空中的空间领域的占有或控制问题,因此常被学界认定为边疆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地缘政治学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疆学说,因此难以完全按其逻辑来解读中国的海洋边疆和空中边疆。最后,新形态边疆理论的薄弱。尽管城市边疆、高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概念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但其对于这些新型边疆的理论阐释并不充分,基本还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即一种以“边疆”作为开拓新领域的表达方式,而缺乏系统性的论述。因此,对西方边疆话语的机械复述,并不能满足新形态边疆及其治理对于相关理论知识的强烈期待。

西方边疆理论中蕴含着一些于我不利的话语和逻辑。诚如历史上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洞见到的那样，西方的边疆理论中确实暗含着一些对中国构成不利影响的因素。近年来，西方学者在所谓“内亚视角”或“边疆中心视角”下开展的中国边疆研究，看似新奇且富有启发，实则普遍带有“去中国化”的学术取向。特别是研究中使用的“中国本部”“汉人中国”“中华帝国”“殖民”等话语，以及将“清”同“中国”区分，将边疆概念同“中国”概念进行剥离的做法，都不宜随便采用甚或盲目追捧。面对中国学界的质疑，有西方学者一再明确表示，其研究只是提供不同的叙事角度而以，并无任何政治意图。但是主观上的无意图，并不能保证客观上的无侵害。一些带有潜在风险的观点和概念一旦被广泛接受，就很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令中国因丧失话语权而陷入被动境地。

当然，西方边疆理论也存在着许多可取之处，应从中汲取精华与获得启发。其一，从国家视角和国家立场出发开展边疆研究。特纳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不但对美国历史进行了全新阐释，而且对于国家开拓新疆并从中获得发展动力，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都对边疆及其治理提出更高要求的形势下，中国学者尤其应当强调边疆研究的国家立场和国家视角。其二，从历史和实践获取理论构建的素材。西方的边疆研究十分重视从中长时段的历史中去总结规律，以及在实证调查中推进理论。这样的研究路径，对于构建中国特色边疆知识体系而言，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其三，陆地边疆中边界与边境研究日渐成熟。在西方，围绕边界和边境问题形成的“边界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理论^[17]。随着国家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日渐凸显，边界与边境必然会成为未来边疆研究的重点内容，而西方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探索。其四，边疆范畴的不断拓展。西方学界总能根据时代形势和国家发展需要，提出新的边疆话语和边疆观念。今天逐渐升温的各种新形态边疆概念，无一不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对于深受传统边疆观影响的中国学者来说，尤为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开拓新视角、创造新知识。

四、中国边疆理论的建构与超越

在边疆问题和边疆意义愈显突出，学术自信和学

术自觉日益增强，以及国家决策层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和创新中国边疆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被空前地凸显出来。而为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就要面对如何看待西方边疆理论的问题：一方面要破除对于西方的迷信，另一方面则需汲取有益成分。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通过边疆理论创新来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进而建立起一套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首先，以有效知识供给为导向。作为与国家治理直接相关的一门学问，边疆研究理应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这里面有两层涵义，即解释历史实践和服务当下实践。当然，解释历史也是为现实服务的。由于西方的理论无法有效回应中国的边疆历史和现实，因此这项工作只能由中国学者来自主完成。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莫过于拉铁摩尔。但他对中国边疆的认识同国人自己的认识相比，可谓大相径庭。中国学者经常使用“边疆中国”概念，但在拉氏那里，“边疆”和“中国”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如《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所谓的边疆，主要是指“蒙古”“新疆”“西藏”“满洲”和“中国本部”之间的过渡地带，而非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边疆。因而，当运用拉氏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边疆历史时，难免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对于当前中国的边疆和边疆治理，无论是在陆地边疆、海洋边疆还是新形态边疆问题上，西方的理论都无法提供太多新的启发，根本不能满足现实对于理论的渴望。这样一来，为中国的边疆实践提供有效的知识和理论，就成为中国特色边疆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和基本价值导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一种理论建构取向的选择，是由西方边疆理论同中国边疆实际之间的张力所导致的。

其次，以本土知识生产为内涵。如上所述，中国边疆理论的构建和创新，应当以有效的知识供给为根本导向。而基于西方经验和西方思维形成的理论，显然是无法担负起这一理论功能的。因此中国特色的边疆理论，必须在归纳总结中国边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必须以本土知识生产作为核心内容。质言之，这是由中国独特的边疆历史、边疆问题和边疆治理实践所决定的。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边疆研究中的本土知识生产，开始于清末的西北史地研究，并在民国时期以边政学的兴起为标志，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科逐步介入这个领域，并产出了大批高

质量的科研成果。但是,中国边疆研究中的本土知识生产,同实现有效的知识供给这个目标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就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从历史总结、政策梳理与提炼、边疆田野调查等方面入手,是保持和提升本土知识生产能力的必由之路。

再次,以概念工具创制为基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概念是构成理论的基本单元,也是进行理论推演的基本工具。因此,离开了学术概念的创制,特别是基础性概念的建构,就无法有力推进中国边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中国拥有悠久的边疆历史,却长期缺少规范统一的概念体系,因此也就无法形成相关的理论述说系统和阐释系统。近年来,随着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如“边疆治理”这样的基础性概念被陆续提出^[18],概念短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总体上仍然无法满足理论建构的需要。除概念短缺以外,中国的边疆研究还存在着缺少基本的概念共识的问题。在不同学科、不同立场、不同视角甚至不同情境下,“边疆”一词的内涵经常是变动不居的,甚至是迥然不同的。核心概念共识的缺乏也直接制约着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创新,从而使得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倡议由来已久,但推进速度却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学者不得不重新回到西方文献中寻找概念供给,以及寻找评判概念优劣的西方标准^[19]。但这并没有破解中国边疆研究的概念困境,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和干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形成有效的概念供给就成为推动中国边疆理论发展的当务之急。

最后,以融入世界知识体系为前瞻。中国边疆理论的建构和创新,不仅要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还要强调理论的普遍化和世界化,否则就容易陷入“关门主义”的误区。毋庸置疑,中国的边疆研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构建中国的边疆理论,并非要将这些西方元素彻底剔除或完全另起炉灶,这显然也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在边疆理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上,中国的也应当是世界的。事实上,也只有在同一标准和维度上,才能谈得上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不然就很难将中西两条轨道上的边疆理论进行比较,也无法形成国际对话和交流。从更大的时空尺度上来看,越是开放性的国家,以及越是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其知识、理论和话语的构建就越应该具有从本土主义

走向世界主义的信心和魄力。回顾历史,西方的边疆理论也正是随着国家影响力的扩散,而逐步从区域性知识发展为世界性知识的。在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的时代背景下,边疆理论也绝不能是一套封闭性的话语,而是要能够形成中西方之间的学术对话,唯有如此,才能够将中国的知识融入世界知识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 [1] 于沛,孙宏年,章拥军,等.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
- [2] 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与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J].学术月刊,2017(4):145-166.
- [3] 万文宣.空权时代的世界[J].新中华,1945(12):10-23.
- [4]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376.
- [5]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七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206.
- [6] 袁剑.边疆理论话语的梳理与中国边疆学的可能路径[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1):164-171.
- [7] 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7.
- [8]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J].前线,1939(2):21-24.
- [9]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1942(5,6):4-14.
- [10] 周平.我国边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J].思想战线,2016(5):64-72.
- [11] 孙宏年.相对成熟的西方边疆理论简论(1871—1945)[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2):12-21.
- [12]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美国边疆论[M].董敏,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 [13] LIMERICK P N. The legacy of conquest: The unbroken past of the american west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7: 25.
- [14] LAMAR H, THOMPSON L.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 [15]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9-170.
- [16] 维克多·普莱斯考特,吉莉安·崔格斯.国际边疆与边界:法律、政治与地理[M].孔令杰,张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17] 弗·阿·科洛索夫.国家边界学理论:新的研究方法[J].牟沫英,译.国外社会科学,2013(5):130-140.
- [18]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84.
- [19] 杨明洪.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33-144.

(下转第192页)